调查观察周刊

本刊主编：易艳刚
值班责编：刘晶瑶、刘婧宇
实习生：胡亦赟

第57期

微信公号：xhmrdxwx　　电话：(010)63076340

15
“剪不断理还乱”
英国“脱欧”心态观察

“一婚穷十年”歪风要刹，移风易俗也要讲“姿势”

光靠移风易俗治标不治本，甚至可能造成新的矛盾。政府引导也要注意“姿态”和“尺度”问题，要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区分出哪些办酒行为是一直存在的，哪些是在后来“跑偏”出现的，要适当保留一些必要的红白喜事项目

本报记者周楠

过年回家10天，参加了8场“人情宴”，道喜背后是苦笑；辛苦赚钱一年，回家出“人情费”，腰包掏空了一半；明明腰包紧张，还要买来高档烟酒，彻夜燃放烟花鞭炮，只为撑场面……

春节期间，部分乡村畸形人情消费愈演愈烈，种种陈规陋习给基层群众带来沉重负担，部分群众形容这个年过得“心惊肉跳、头皮发麻”。

移风易俗显得尤为迫切。幸好多地早已展开探索，效果也比较明显。但对于部分地区由政府主导的移风易俗和“一刀切”整治方式，群众中也不乏质疑和担忧的声音。

“人情大于债，头顶锅子卖”

王蓉的家乡在华东某省的农村，当地素来以“人情重”“彩礼高”闻名。今年春节回乡，从腊月二十六到正月初六，她参加了8场酒席，涉及结婚、寿礼、乔迁、周岁、建房等主题，人情费都是400元起步，高的达1000元。她说这个节过得头皮发麻，“最多的一天赶了三个场，必须人到情到。”

春节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。近年来，部分乡村人情负担之重，陈规陋习之突出，已令人谈之色变。

前几年，湖南省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在开展移风易俗之前，发生过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。

村里的贫困户徐传德，房屋倒塌多年，一直在邻居家借住，住的地方破旧不堪，生活不便，甚至没有手机信号。2016年，驻村扶贫队帮村里建了集中安置房，生活便利，一套价值10多万元的新房，只需交5000元就可拎包入住。

奇怪的是，徐传德符合入住条件，却始终躲着不要这个福利。扶贫队员爬上山来家访，老徐才说了实情，“我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，山下人口集中，人情往来多，一年人情开销就要四五千元。”

办酒、节庆、人情往来等各种乡风乡俗，在过去很多年发挥过团结乡邻、凝聚人心、互助共赢的宝贵作用。但是，近年来，部分乡村的人情风越刮越歪，逐渐偏离了原来的初衷。最典型者，莫过于人情“异化”过程中频发的“无事酒”成风。

红喜事、白喜事、升学宴、谢师宴、参军宴、满月宴、建房宴、装修宴，还有逢五逢十生日宴等，仅仅是“常规动作”。人情礼金水涨船高，过去的50元起步，现在200元起步，关系稍微亲密的500元起步，关系亲密的800元～1000元是标准。这些人情债还不能躲，“人情大于债，头顶锅子卖”“宁荒一年田，不丢人情场”。

有的地方官员和地方人大代表做过调查，部分乡村村民的人情支出竟然占到整个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，低收入家庭的年人情支出甚至超过年收入。由于支出太多，村民很难维持长时间“光出不进”，只好找理由办酒收礼“回本”。前些年，中部某县流传一种说法：一个普通农村家庭，如果两三年不办酒，家庭财政就会破产。

“吃酒送礼——负担加重——自己办酒收礼——再吃酒再送礼”这样的怪圈开始循环。部分村民不得不绞尽脑汁找办酒名目，办各种“无事酒”。12岁生日、36岁生日、两位老人合办“百岁酒”“150岁酒”等，外人觉得不可思议，在当地却常见。

还有村民遇到过“买房宴”，送了礼吃了酒，主人始终不说新房在哪里，大家其实也心照不宣。有的地方以此创作讽刺剧，讲述一农民修建厕所后，以“三改重点工程落成”名义办酒。

踩下“人情歪风”的“急刹车”

不堪重负下，越来越多群众开始抱怨，但很少有人敢迈出第一步。记者节前在中部地区采访，多位村民坦言，其实大多数人有停止办酒的想法，都知道继续下去只会花更多钱，但没人敢迈出第一步，怕被人笑话。

近年来，在我国多地的市、县“两会”上，部分人大代表直斥异化变味的“乡村人情风”，建议政府引导整治，建议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拉开了破除陈规陋习、禁止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序幕，王蓉们面临的“尴尬”过年方式将成为过去。

湖南、浙江等地少部分乡村出现了民间自发主导的“去陋习，树新风”行动。由村庄德高望重的老党员、老教师、老干部等主导，成立红白理事会，建立专业的志愿者队伍，制定村规民约，协助村民规范办酒，踩下了“人情歪风”的“急刹车”。

记者了解到，这些村规民约兼顾了原则和人性化，规定可以操办的合理操办、适当收送礼金，不宜操办的坚决不允许收送礼金。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：“这种方式容易得到广泛理解和响应，村民往往抹不开面子，政府又不好介入太深，由民间自治，叫停人情风，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，这样便可顺理成章。”

相对而言，更多乡村的移风易俗是由政府主导。近年来，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福建等多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移风易俗行动。首先要求从党员干部带头做起，对党员干部的婚丧嫁娶划出纪律红线，党员干部签下承诺书，规定只准吃哪几种酒，规定人情礼金不能超过多少元。

一名县委书记这样解释背后的深意：“一则通过党风带民风，带动作用确实明显，二则党员干部在乡村占主导地位，只要他们不参加，很多人情往来就运转不下去。”

与管住党员干部同时进行的，则是村支部和村委会制定专门的村规民约，明确办酒范畴，界定办酒条件和程序，明确违禁办酒的处罚，并由村红白理事会监督执行。

比如，记者春节期间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三封寺镇了解到，当地出台了规范办理婚丧事宜的文件，倡导“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其他不办”，规定气球拱门不超过一个，不放烟花鞭炮，每桌酒席总价不超过300元，丧事不做道场，不搞其他封建迷信活动。除婚丧嫁娶外，老人小孩生日、新房落成、升学等其他事宜不办，如要办理，只邀请自己的直系亲属参加。

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，这场移风易俗行动的推进比较顺利，效果也比较明显。

村民的感受最真切。三封寺镇华一村村民刘忠立说，现在负担大为减轻，很多人家每年的人情费用从一万多元减少到两三千元，过年过节也不再放鞭炮，轻松了很多，今年这个年过得很清爽。

村支书刘再跃原来以为自己会得罪全村的人，实际效果与他想象完全不同。他感慨，“推行一年半，没想到进度这么快，效果这么好，也说明过去大操大办背后，大家早就苦不堪言，移风易俗顺应了民心。”

以三封寺镇为例，镇里统计发现，以前每户每年人情开支平均1.85万元，现在降到了5550元，全镇8500户可减少支出1个亿。放大到岳阳市，自推进移风易俗以来，全市农村烟花爆竹燃放同比下降了80%，人情开支下降了40%。

贺雪峰教授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团队已连续7年撰写春节回乡记，记录家乡发生的变化。在今年已经整理出来的45篇“回乡记”中，多名成员不约而同以移风易俗为重点，对这种变化表示肯定。

移风易俗不能搞“一刀切”

不过，也有学者担忧部分地方工作方式简单粗暴，移风易俗的标准界定不科学，对传统习俗文化传承构成威胁。

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文胜认为，许多民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的农村不准老人办寿宴，春节完全禁鞭炮，是过度的移风易俗。部分地方政府初衷是好的，但要反思过去“破四旧”和农村中小学撤并的教训，反思过去部分地方大规模推进“平坟运动”和“合村并乡”等产生的问题，防止对孝道、忠义、仁爱等价值观念和礼仪体系产生的影响，对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信仰产生的冲击。

其次，近年来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风俗问题，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，光靠移风易俗治标不治本，甚至可能造成新的矛盾。

最典型的莫过于农村彩礼问题。部分农村地区男女比例不平衡，加上大量女性外出，导致农村地区婚姻竞争激烈，一步步拉高婚姻成本，彩礼越来越高，甚至“一婚穷十年”。不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，光靠强制性的移风易俗规定收效甚微，彩礼钱只能从台前走到幕后，甚至不排除变本加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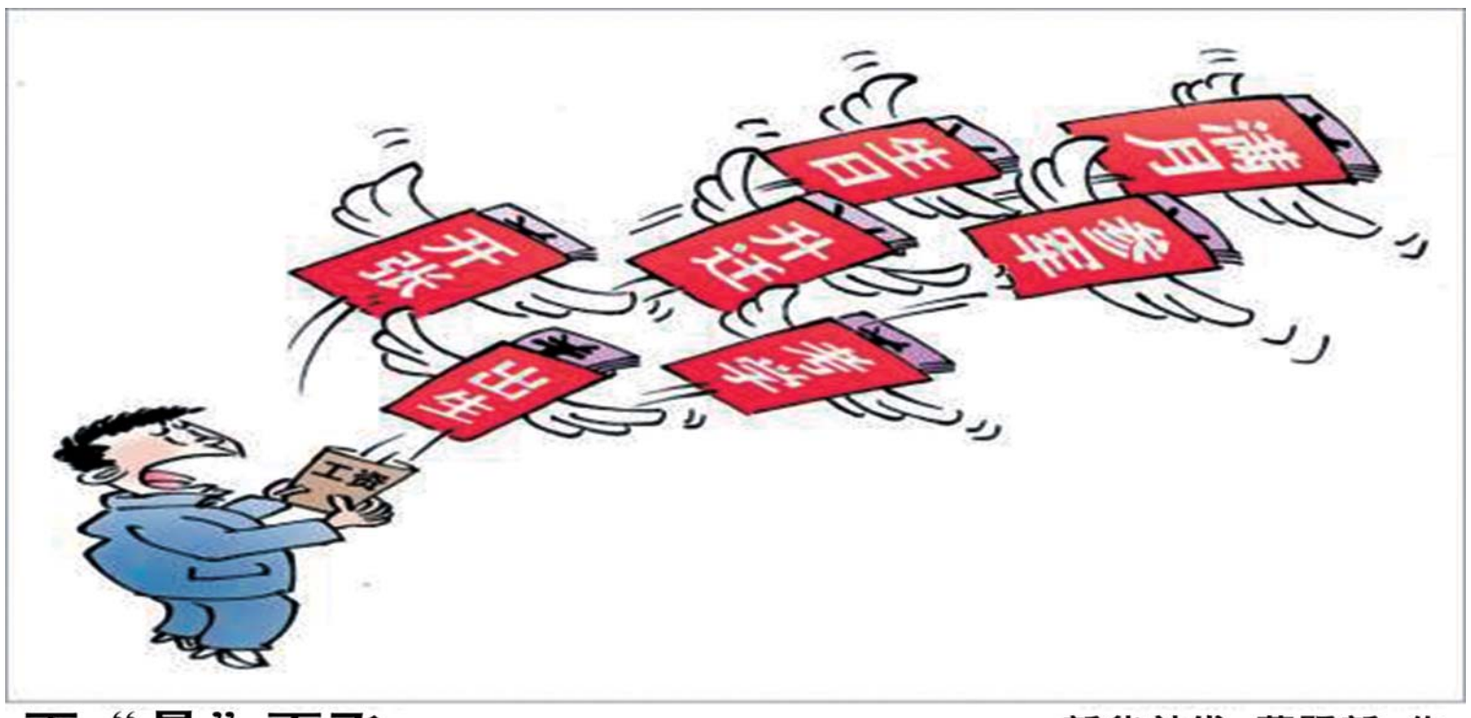
其三，部分地方移风易俗采取“一刀切”方式，背后是否存在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？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部分村民办了满月酒、寿宴后，被取消低保、养老补贴等。村民认为这些酒自古以来就有，不应完全禁止，处罚是不对的。

也有学者质疑，这种方式过于一刀切，也是懒政的一种表现。政府引导也要注意“姿态”和“尺度”问题，要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区分出哪些办酒行为是一直存在的，哪些是在后来“跑偏”出现的，要适当保留一些必要的红白喜事项目。

其四，地方政府动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加以管控，效果明显，但没有激发民间活力，难以形成长效治理机制。很多地方，还是由政府强力推进，从决策、发文到执行，没有充分征求大众意见。

有学者认为，让社会自身去培育纠错机制和向善自觉，比一个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来得更为妥帖。“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主性，找到合适的方法，分清各自的边界，政府、社会与公众才能各安其位，在相互促进中共同移风易俗。”



不“易”而飞　　新华社发　蒋跃新　作

“返乡儿童”现象观察：育儿压力不该由家庭独担

无奈的选择既有对孩子的愧疚，更有对父母的歉意。都市“返乡儿童”问题的背后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，要减轻这种压力，需要从家庭、市场、政府等多方面综合发力，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

本报记者程士华、关桂峰

大城市“居不易”、都市里的工作太繁忙、住房太紧张……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，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，一些年轻父母选择将学龄前的孩子送回老家，由老人抚养。

与备受公众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相似，都市“返乡儿童”也有着相同的苦恼：学龄前的成长过程缺乏亲情陪伴、家庭教育的支持。

社会应该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政策支持——不论父母是否在，爱都不能缺席；在社会层面，应当探索建立健全科学的育儿社会支持体系，减轻家庭育儿的压力。

对孩子有愧疚，对父母有歉意
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特别是在一线城市，生活的压力更大。杨先生是在北京工作的白领。春节后，由于夫妻两人都要开始上班了，他不得不把两岁的儿子送回了距离北京300多公里的老家——河北省行唐县。

爷爷奶奶年纪也不小了，把孩子交给他们抚养，既有对孩子的愧疚，更有对父母的歉意。“的确很无奈，我们也考虑了很久，才做出这个选择。”杨先生说，家里只是个小两居，请保姆白天来家里照顾，我们下了班保姆就回去了。他和妻子身心俱疲的状态维持了大约一年，两口子都觉得撑不下去了。

将父母接到北京帮助照顾孩子？杨先生夫妻俩也考虑过这个办法，但是一来房子小，父母勉强住下来，5口人比较拥挤，二来父母生活不习惯，很难适应北京的生活。

记者在北京、上海采访多名“返乡儿童”家长发现，这些家庭的住房大多是两居室，面积从40平方米至90平方米。如果父母双方来一个的话，育儿时难以支撑；如果父母双方都来，就是5口人挤在一起，特别拥挤。

还有的父母，受困于一线城市保姆、幼托机构收费过高，不得不将孩子送回老家。在深圳一家民企工作的丁先生把1岁多的女儿送回四川老家。“不是不想带孩子，是付不起保姆钱。一个保姆一个月要8000元，而且只管白天。”丁先生说，夫妻俩月收入近3万元，但是去掉房贷以及保姆费用，也没剩多少钱了。“还不如把孩子送回老家，我们把给保姆的钱寄给父母。”

《北京市托幼服务问题和对策研究》一文显示，从北京市居民需求来看，有64.1%的家庭希望孩子“在3岁之前接受早期教育”，34.9%的家庭希望孩子能上“幼儿园亲子班”，21.2%的家庭希望能在“离家近、有资质的幼儿看护点”，20%的家庭希望能提供“社区公共早教”，14%的家庭希望去“比较出名的早教中心和机构”。

祖辈抚养不能完全代替父辈

记者调查发现，孩子“返乡”之后，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——

有的孩子因为隔代抚养的溺爱，养成了难以纠正的不良习惯。北京市民刘先生说，孩子长期在老家待着，目前已经3岁多，还要大人喂饭。孩子要啥老人就给买啥，稍不如意，孩子就满地打滚等，让两口子很头疼。

有的孩子因为缺少父母陪伴变得更害羞、不自信。北京市民卢女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她告诉记者，相比于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，由祖辈抚养的另一个孩子性格相对自卑、内向一些。比如带孩子上街，碰到一个同事打个招呼，他都要躲在自己身后；有陌生人来家里，也要藏起来。孩子在表达自己观点看法的时候，也相对不自信。

在北京工作的秦女士说，老家空气好，北京秋冬季太干燥，尤其是空气污染重的雾霾天气，孩子不适应，所以每到秋冬季，她都会把孩子送回广西老家。“老家有表弟、堂姐可以一起玩，让孩子多体验小城市的生活。”秦女士说，自己的母亲也要在老家照看姐姐的孩子，于是就把女儿放在外婆家。和表姐一起玩、一起长大，女儿很开心。

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表示，在祖辈的大家庭中长大，能为孩子提供愉快、宽松的成长环境。同时，便于孩子增强对情感感知、规则意识的建立、社会关系的认知等。

“返乡儿童”群体，在一些比较大的省会城市也很常见。例如，安徽省合肥市的程女士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把5岁的儿子送回了河南省郸城县的农村老家，上小学前才接回合肥。程女士的丈夫每年有7个月时间在出差，自己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，根本忙不过来。

“孩子年纪越小，每日每时的陪伴所形成的心灵抚养愈发重要。”成长教育师兰海说，年轻父母尤其要注意的是，一般来说，0至6岁这一阶段，父母的抚养几乎可以铸就儿童的心理特征、人格特征、人际交往模式。这种微妙的差距，使得祖辈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替父辈。

建立社会育儿支持体系

专家认为，在抚养孩子过程中，父母可以不在场，但父母之爱绝不能缺席。都市“返乡儿童”的背后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，要减轻这种压力，需要从政府、市场、家庭等多方发力，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育儿社会支持体系。

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指出，孩子由父母带大是最好的，如果父母没时间，选择送祖辈扶养，一定要考虑祖辈是否有育儿能力。建议父母要和祖辈一起制定规划，参与到孩子扶养当中，多和孩子沟通，包括面对面和视频。父母不要因为工作忙，就把对孩子的教育、抚养完全交给祖辈。

北京市民杨先生告诉记者，每天晚上到家后，夫妻俩都要通过视频和儿子说说话，一般每个月都开车回老家一次，和儿子一起过周末。
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认为，都市“返乡儿童”问题的背后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，要减轻这种压力，需要从家庭、市场、政府等多方面综合发力，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。

据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段婷婷介绍，近年北京市人口出现波段性生育高峰，流动人口快速增长，3～6岁入园学额紧张，不少公立幼儿园取消了托班或亲子班，托幼服务资源愈加匮乏。再加上，托幼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，部分机构收费较高，能同时提供托幼照料和教育服务的机构少，难以满足家庭，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托幼需求。

黄家亮建议，在政府层面，鼓励幼儿园或其他社会力量开设幼儿日托服务，加大财政扶持力度，逐步构建0～3岁育儿支持服务体系；在市场层面，鼓励规范以小饭桌形式托管幼儿模式的发展；在社区、家庭层面，可以探索建立同小区多户低龄儿童家庭互助组织，或者借鉴日本等国家在婚姻法等方面对全职家庭主妇的保护，让女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回归家庭，而无须考虑经济、社保等方面的压力。

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，这一问题变得更具紧迫性。一些受访家长反映，近年来二孩放开了，但自己根本不敢生。“有朋友生了二孩，把70平方米的房子隔成四居室，客厅才6平方米，特别促狭压抑，”一名受访家长说。

目前，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托幼服务发展，把托幼服务视为政府责任的一部分。我国也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，尽快制定托幼服务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法规，出台托幼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托幼服务机构设置管理办法。